

国际格局与日本政治大国谋求*

孟晓旭 辛晓阳

【摘要】作为战败后崛起的国家，日本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深受国际格局的影响。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使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重新获得主权国家的身份。在冷战格局的框架下，日本在经济大国基础上提出了谋求政治大国的目标。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向多极化转变，日本将其视为实现政治大国的“机运”，期望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以及在国际秩序和经济体制方面发挥责任和作用；同时，日本在军事力量上也积极突破，为其践行政治大国化目标助力。21世纪后，多极化格局深化，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进程加速，增强自身在区域经济中的领导力和影响力，谋求修改和平宪法，突破战后军事限制，在反恐等国际事务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活跃，推动政治大国化目标的实现。当前，日本政治大国的追求仍面临着不少障碍。

【关键词】国际格局；政治大国；普通国家

【作者简介】孟晓旭，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辛晓阳，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16级研究生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and Japan's Pursuit of Being A Major Political Power

By Meng Xiaoxu, Xin Xiaoyang

【Abstract】The boom of post-war Japan is deeply affe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when choos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state. The bipolar architecture of the Cold War has made Japan a sovereign state again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in the Cold War framework, Japan has come up with the goal of being a political power based on its economic strength. After the end of Cold War, multipolar architecture has become the main trend in the world, and Japan has regarded this trend as its opportunity to realize its political dream, expecting to be more involved in world affairs as well as taking responsibilities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economic system. Meanwhile, Japan has also made a breakthrough within military

*本文系北京市青年英才计划资助项目“日本政治大国化进程分析及评估”(项目编号: YETP1323); 国际关系学院2015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追加经费科研项目“战后中日安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 3262015T76)的阶段性成果。

power and used this to become a political power.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the multipolar architecture has deepened, while emerging nations have risen sharply collectively. Japan has speeded up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a political path accordingly, enhancing its leadership and influence in the regional economy, revising peace constitution to breakthrough military shackles, playing a role in counter-terrorism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us making its dream of being a political power come true. Nevertheless, Japan has faced obstacl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Political Power, Normal State.

【Author】 Meng xiaoxu,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UIR; Xin xiaoyan, postgraduate of UIR.

政治大国是战后日本最突出的战略目标,为日本多个内阁所追求。作为战败后崛起的国家,日本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深受国际格局的影响。在冷战时期,日本因美苏两极的对抗重获主权国家身份,在美国的军事庇护下成长为经济大国,并以此为依托提出了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冷战结束初期,日本抓住时机,在多极化的国际格局背景下,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将对政治大国的追求由口头阶段发展至践行阶段。进入21世纪,多极化的趋势不断深化,日本与崛起的新兴国家之间竞争加剧,日本开始试图通过修宪等方式扫清通往政治大国道路上的障碍,积极参与国际与地区事务,增强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影响力,主动参与联合国维和等国际和平军事行动,以其经济大国与军事大国的身份为政治大国的实现奠定基础。日本在追求政治大国化的进程中深受国际格局的影响,作为多极化格局下重要的力量中心又反过来影响了国际格局的演进。本文旨在透过研究战后不同的国际格局下日本对政治大国化的态度和举措,分析国际格局与日本政治大国之间的演进关系。

一 两极格局与日本政治大国谋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战败投降告终。战后初期,日本被剥夺主权并处于盟军的统治之下,尚无余力思考国家发展目标。在驻日盟军的指导下,日本进行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奠下了战后日本发展的基本框架,主要措施有:(一)解散军事机构、废除军事法令;逮捕并审判战犯嫌疑;剥夺军国主义分子公职和解散军国主义团体;禁止军事科学研究和军需生产;实行严格的赔偿计划。(二)颁布五大改革指令:赋予妇女参政权和妇女解放;保障工人的团结权和团体交涉权;废止具有压制性质的各种制度;教育自由化;经济民主化。(三)进行两次农地改革,改革长期以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主意基础,阻碍民主化的半封建土地制度。(四)解散作为侵略战争推动力量的财阀。(五)修改日本宪法和通过其他一系列制度性法规。同时,日本也被剥夺其他独立国家所拥有的外交权^①,

^①1945年10月25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命令日本政府立即向盟国方面提交全部驻外外交机构的财产和文件。11月4日,盟军又进一步禁止日本与在东京的中立国和盟国代表直接接触。日本政府最终发表“停止外交权”的声明,并召回在瑞士、瑞典等中立国的外交领事代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完全依附美国的政策,一切对外交涉和外交活动均由美国处理。

在恢复独立之前不存在外交。^①

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本严格的军事化和民主化措施是基于彻底削弱日本战略考量基础之上的。1945年9月22日,美国政府颁布的《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宣称,最终目标是“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②美国致力于改造和惩罚日本,并不打算助其重建或视其为盟友。美国忽视了日本因长期深陷战争泥淖而工业衰败,生产停滞的状况,也不在意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打算将日本改造成一个“现代而毫不重要”的国家即可^③。作为日本实际的管理者,美国此时并未将日本视为自身战略发展的合作伙伴,因而没有给日本制定明确的改革方向,也未赋予日本参与国际社会的角色和身份。但是这种不断摇摆的对日政策并没有持续太久。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标志着冷战的形成。冷战格局改变了日本改造的进程与方向,也打下了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基础。

冷战伊始,为了在东亚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立意把日本打造成强有力的反共堡垒,开始转为扶持日本,使之成为对抗共产主义的“先头阵地”。一位在日活动的英国联络员曾表示,“反对共产主义”的主张提出后,日本所有的英文和日文期刊均利用大量篇幅进行持续性的反共报道,反映了日本面临的“共产主义威胁”已经取代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成为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头号敌人”^④。在此社会环境的影响下,美国开始调整对日政策的内容和方向,使日本在政治上向西方阵营靠拢。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在旧金山就美国对日政策发表演说,提出“把当初的方针彻底改变为新方针的时刻业已到来”。^⑤美国认为在冷战的背景下,日本“将对亚洲未来的政治格局产生强烈的影响。”^⑥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委员会主席凯南的报告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NSC13/2)是美国扶持日本并把日本留

^① [日]五百旗头真主编:《日本外交史》,吴万虹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22页。

^② (英)F.C. 琼斯等著:《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教研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743页。

^③ Richard B. Finn, *Winners in Peace: MacArthur, Yoshida, and Postwar Japa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28.

^④ 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of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34.

^⑤ [日]末川博·家永三郎编:《日本现代史资料·日米安保条约体制史》(第二卷)(1948-1960),三省堂,1970年,第643-645页。

^⑥ FRUS, 1949, VII, p1218-1220.

在西方阵营的政策基础。1951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把日本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

冷战初期，充分利用冷战格局下美国的安全保护，减少军事开支，减缓经济压力是日本的重要策略。朝鲜战争是国际冷战在亚洲的热战表现。杜勒斯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天访问日本，强烈催促吉田茂首相成立大约由30万人组成的日本军队^①。但是吉田反对立即大幅重整军备。^②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只是进行了有限的回应——成立7.5万人的警察预备队以及把海上保安厅扩建至16,600人。吉田奠定的“重经济，轻军事”的发展路线后来称为“吉田主义”。高坂正尧指出“吉田主义”的“非介入政策将使日本降低紧张程度，减少安全保障成本”^③。“吉田主义”将日本置于美国核保护伞下，在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持续了几十年之久；直到1995年，日本的军事防御开支仍仅占GDP的0.96%，远低于美，英，法，德等西方大国^④。美国提供的安全便车为日本战后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

显然，尽管日本处在冷战的西方阵营中，但它没有完全受限于冷战格局，既没有加入到冷战军事对抗的前沿，也没把经济力量用到国防和军事对抗方面。与此同时，自日本被美国划入两极对抗中的西方阵营后，美国开始积极地帮助日本进行战后经济重建。1948年12月29日，麦克阿瑟向日本提出“稳定经济九原则”^⑤，声明美国对日政策将从1949年开始从政治层面转向经济层面，并于次年调派底特律银行家约瑟夫·道奇赴日作为日本经济重建工作的顾问。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特需”军武刺激了日本军工企业的生产活动，数额惊人的军需订单使没有实质参战的日本大发“战争财”。得益于美国的扶植、朝鲜战争的特需经济以及“吉田路线”的执行，至1955年，日本国民经济和工农业生产的主要经济指标均已恢复或超过战前水平。1956年7月17日，日本经济企划厅发表题为

^① John W. Dower, ed., *Origins of the Modern Japanese State: Selected Writing of E.H.Norm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5, p.40.

^② 吉田茂的理由是：①日本没有多余的经济能力重整军备；②战争的善后工作尚未结束，由于战败的创伤，日本国民丧失了重整军备的心理基础；③日本内部还存在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的危险；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备存在疑惧。因此，再军备应是个“十分缓慢的过程”。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吉田茂认为“充实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安定民生，乃是先决问题。”见[日]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二册，韩润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117页。

^③ [日]高坂正尧：《通商国家日本の運命》，《中央公論》，1975年第11期，第137页。

^④ Sun-ki Chai, *Entrenching the Yoshida Defense Doctrine: Three Techniques for Institution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July 1997, p.389.

^⑤ 戴振豐：《邁向和談之路：吉田茂在佔領改革下的和談戰略（1945-1951）》，亞太研究論壇第三十八期，2007年，第113页。

《日本经济成长与近代化》的经济白皮书宣称已经走出“战后”。此后，日本又经历了“岩户景气”、“伊奘诺景气”，经济景气现象长期持续。

冷战格局在提供安全便车和经济红利的同时，还给日本提供了迈向战后国际社会所需的政治身份。朝鲜战争中，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在苏联的要求下加入战争，作为远东地区的新兴力量加入了这一地区的大国博弈之中^①，美国由是立意将同处东亚地区的日本打造成自己在本地区的坚定同盟力量。朝鲜战争作为冷战背景下的热战激起了美国在政治上扶持日本的决心，处在西方阵营中的日本由是获得了独立的政治身份。1951年9月8日在冷战格局影响下签订的《旧金山条约》首章的第一条即申明“各盟国承认日本人民对于日本及其领海有完全的主权”，表明了美国支持日本重新成为“主权国家”的态度；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美结束了对日长达七年的军事占领，日本再次获得了“主权国家”的身份，并成为其谋求政治大国的身份起点。此外，在冷战格局之下，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获取了宝贵的政治空间，吉田及其后内阁进行的一系列反民主化措施，包括解除之前被剥夺公职者的处分等，使大批旧政治家重返政坛，这又为建立在保守体制基础之上的政治大国目标做好了政治准备。

伴随着经济大国地位的实现，日本感觉已经追上欧美发达国家的“坂上之云”，开始公开表露政治大国追求。^②1970年9月18日，日本外相爱知葵一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要求重新考虑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构成。20世纪80年代，日本认为“自己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大国，国际社会正在期待日本能够发挥引导世界前进的火车头作用。”^③1983年5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提出要对西方安全承担责任。7月，他在家乡群馬县对选民说：“今后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要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④。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大国”的目标。但是，由于当时日本国内外舆论对“政治大国”的提法反感，为了避免不良印象，1983年8月，中曾根在自民党干部轻井泽研修讲话中把“政治大国”的提法更改为“国际国家”，注重国际影响力方面，策略地

^① Stanley D. Metzger, *Liberal Japanese Peace Treaty*, 37 *Cornell L. Rev.* 1952, p.382.

^② 孟晓旭：《安倍“积极和平主义”的谱系》，《世界知识》2015年第18期，第43页。

^③ [日]福田纠夫：《回顾九十年》，谢秦译，王珂审校，东方出版社，2008年4月，第157页。

^④ [日]歴史学研究会：《転換期の世界と日本》（5），青木書店，1991年，第166-167页。

转移国内外视线，其实目的还是追求政治大国目标。

受益于冷战格局的日本在某些时段也表现出突破两极格局的一面。在冷战格局的演进中日本在某些问题上适时进行独立自主的尝试，并产生一定的影响。越战期间，美国支持的南越和中苏支持的北越长期存在政权冲突，越南成为冷战背景下大国博弈的战场。美国要求盟国共同对抗在越扩张的社会主义，1964年组阁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顺应美国号召的同时，也独立积极探索越南问题的症结所在。1965年一月下旬，佐藤内阁派遣一名自民党籍国会议员到西贡市（后称胡志明市）观察局势，次月又派遣一名参议院议员同南越的政治势力和宗教领袖进行交谈，发现问题在于南越政府的政治脆弱性。在这之后，日本成为所有越战参涉国中唯一尝试在越减缓冲突的国家。几年之后，美国开始试图从越战的泥潭中脱身。1969年美国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讲话，表示不会再派更多美军赴越作战^①。美国对越战略的调整给日本扩展影响提供更多的空间，1970年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报告中申明日本愿意加强同北越的交流和联系，并期待和北越的首脑进行接触。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冷战格局发生变化，中苏关系破裂后，美国开始同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进行接触。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出现转机，两国开始共同着手解决越南问题：美国利用同中苏间的三角关系作为巴黎和谈上对越的谈判筹码，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向北越施压^②。此时的国际形势给日本提供了难得的外交机遇，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上台就在首次内阁会议上公开宣布加快同中国间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并于9月正式访华，随即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同中国建立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田中首相明确提出，应该根据形势变化和日本国家的利益，自主地决定外交政策。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田中内阁改变了向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实行“多边自主外交”。包括田中外交以及鸠山一郎内阁的对苏外交在内的“自主外交”也显然是日本冲破两极格局，尝试构建政治大国的一部分。日本也积极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接触，1974年1月田中角荣访问东盟五国，提出“睦邻”等外交原则，加深与东盟成员之间的理解和互信。在两极格局下，日本

^① J.L.S.Girling, *The Guam Doctrin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6, No.1, 1970,p.48.

^② Odd Arne Westad & Sophie Quinn-Judge, eds., *The Third Indo China War: Conflict Between China, Vietnam and Cambodia, 1972-79*,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23.

以独立国家身份进行拓展性的外交活动。日本前外务次官栗山尚一就指出，冷战时期日本适应大国赐予的国际秩序的外交模式是成功的，但已经成为先进国家的主要一员的日本，再也不能继续推行以过去那样的国际秩序为条件的被动外交了，而必须通过积极努力地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来确保本国的安全和繁荣，尽快从中小国家外交转变为大国外交。^①

越南战争使日本花了十年时间重新定义其在世界上的位置^②，随着冷战格局的松动和国家间合作的加强，日本抓住国际格局向多极化转变的历史机遇，开始在切身利益的驱动下主动而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力图在太平洋地区发挥更大的经济和政治作用。1980年，在日本太平洋首相的倡导下，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韩国，东盟各国及太平洋三个岛国在澳大利亚与会，成立了太平洋合作委员会。以此为标志，日本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得到实施与进展^③。此后，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及竹下登也相继推动了日本环太战略的落地和深化，直至APEC正式建立。日本在推进环太平洋合作的进程中积极主动的态度表露了其致力于在更大的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追求，日本政治大国化进程开始从目标设定过度至践行阶段。

二 多极化格局伊始与日本政治大国的嬗变

尽管是冷战的最大赢家，但在冷战结束前夕，日本预测并盼望多极格局的到来，将之视作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的“机运”。1988年，日本国家战略型智库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提出，“霸权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将形成不同于过去的多元文明、多极化国际格局。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应该在国际秩序和经济体制方面，发挥应有的责任和作用。^④此时日本经济已经持续高速发展三十余年，稳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经济强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为本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提供了助力。1989年2月24日，东京新宿御园举行了昭和天皇裕仁

^① [日]栗山尚一：《激動の90年代と日本外交の新展開——新しい国際秩序構築への積極的貢献のために》，《外交フォーラム》，1990年5月号。

^② Thomas R.H.Havens, *Fire Across the Sea: The Vietnam War and Japan 1965-1975*,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7.

^③ 徐勇：《日本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战略意义》，《外国问题研究》，1988年第4期，第10页。

^④ [日]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编：《90年代日本的课题》，彭晋璋监校，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年，第3-4页。

的葬礼,有163个国家及28个国际机构的领导人或代表出席。日本舆论评述为,“大丧之礼成为印证经济大国日本的国际地位的一次仪式”。^①

另一方面,大丧之礼对日本人来说也象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1989年开始的东欧剧变,12月的美苏马耳他首脑会晤,特别是1991年前苏联的解体,标志着两极格局的正式终结。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日美安全同盟重要性的减弱,美国作为国际经济秩序主导者身份的弱化,以及日本所受世界格局限制的状态被打破。为了适应多极化的世界形势,日本支持削弱美国的霸权,将日美同盟伙伴关系逐步发展为全球性伙伴关系。^②国际形势的种种令人震惊的变化让日本跃跃欲试,日本认为自己的时代已经到来,日本对政治大国的追求开始逐步付诸实践。1990年,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致信美国总统布什,宣称“必须以美、日、欧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随后海部俊树访问欧共体与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联邦德国,表明日本是国际秩序的主要责任者。^③在同年3月的施政演说中,海部表示日本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确保在国际社会中的发言权。^④同年5月,海部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正处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转折点,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出现,日本愿意并且有责任参加这一进程,为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⑤

1990年8月至1991年2月,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的爆发给冷战后的日本由经济大国实现政治大国的追求既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日本作为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国,面临着多方迫使其直接参战的压力。美国为了诱使日本参战,甚至暗示日本有可能因此在未来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⑥日本犹豫不决。由于战后几乎每一次军事问题都会造成日本国内激烈的政治冲突,时任首相海部俊树担心日本参战“可能会激怒伊拉克”而使日本人民陷入伊拉克与科威特的战争泥淖之中,最终“推迟”了原定至中东地区的行程,并放弃出兵。^⑦与此同时,

^① 朝日新闻社编:《从朝日新闻看20世纪》,1999年版,第151页。

^② Courtney Purrington, Tokyo's Policy Responses During the Gulf War and the Impact of the "Iraq Shock" on Japan, *Pacific Affairs*, Vol.65, No.2, (summer 1992), pp.161-162.

^③ [日]宇治敏彦:《日本首相列传》,潘昊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第448页。

^④ [日]日本外務省、「第118回国会における海部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1990年3月2日)」,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90/h02-contents-12.htm>.

^⑤ 李建民:《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0页。

^⑥ Henry Cutter, Analysts Label Aid Package a "Policy Mess", *Japan Times*, 10-16 September 1990, p.1.

^⑦ Andrew Bennett et al., Burden-Sharing in the Persian Gulf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No.1, (Winter 1994), pp.62-65.

为体现出经济大国的份量和对国际社会的领导作用,日本也致力于用经济手段发挥作用,实施了限制伊拉克出口,暂停日本对伊拉克的贷款和投资等一系列举措,并在这场战争中共支付了130亿美元。经济手段并没有为日本赢得国际声誉,甚至使日本面临失去政治大国地位的境地。^①科威特战后的致谢名单中没有提到日本;美国批评其是“纸上盟国”、“出钱不出力”,怂恿日本在军事贡献方面更进一步。对此,《朝日新闻》评述到:“作为经济大国,日本的资产还仅仅是经济力量,而在政治、外交、军事和理念方面,日本还缺乏作为大国的素质。”^②

作为“海湾战争中的一大输家”,日本在海湾战争后对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都有了更深的认识,尤其是意识到过去对军事的保守态度已经成为政治大国目标实现的阻碍因素,日本由是开始谋求国际舞台上的“军事作用”。日本政界的主流意识明显更加积极,日本NHK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已经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是否应该比过去做出更多的国际性贡献”的回答中,68%的人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关于国际性贡献的具体方式,66%的人认为“除了资金及物资的援助以外,还应向海外派遣有关人员”。15%的人认为“可以持小型自卫武器,参加监督停战活动”;11%的人赞同“日本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另有10%的人认为“日本亦可加入海湾战争时的多国部队”。^③

多极化的格局和海湾战争的教训使日本明白:在没有相当的军事实力作为支撑的情况下,日本一跃成为“政治大国”的梦想恐难实现。日本由是开始积极谋求军事安全领域的扩充空间,反思过往在军事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转而将以日美安保体制为核心的日美同盟作为其走向军事大国的重要平台。^④1995年11月,日本通过新《防卫计划大纲》,标志着提升军事力量成为日本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之后,日本开始大力发展军事技术,数额庞大的军费支出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日本自卫队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已达到相当规模,日本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军事技术大国。

经济和军事的发展为实现日本政治大国化的目标打下了扎实的根基,随着世界多极化格局的逐渐明朗,日本开始试图跻身世界领导者的行列。日本的一些政

^① 雨谷:《海湾战争与日本》,《日本学刊》,1991年第3期,第146页。

^② 《朝日新闻》,1994年10月29日。

^③ [日]NHK:《广播研究与调查》,1993年10月,第1116页。

^④ 徐万胜,《日美同盟与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倾向》,《当代亚太》,2004年第4期,第10页。

治家和学者认为,为了增强日本作为冷战后时代的世界领导者的意识,就必须批判冷战格局下的“一国和平主义”。1992年,中曾根康弘等合作编写了《冷战以后》一书,书中明确提出,“一国和平主义已经没有市场了,欲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只有将经济和军事密切结合起来”,^①“对于今后的日本来说,最大的课题是领导权问题”。^②“一国和平主义是独善其身的不负责任的和平主义。这种和平主义是缺乏领导意识的表现,而要使日本具备领导意识的第一步就是要反省和平主义的态度”。^③

前苏联解体后的多极化格局以及关注到军事在冷战后的作用,日本进一步深入思考国家的发展道路。1992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提出,日本必须向国际社会表明它要争取建立什么样的世界,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并且发挥与国力相称的领导力量。^④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开始出现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国家化”思潮,“普通国家”开始作为政治大国的过渡产品。该思想代表人物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提出,“日本即使怎样出钱,也不受尊敬。这是国际政治的冷酷现实。”^⑤小泽呼吁日本要成为成人化的“普通国家”,而其要素有二:一、“被国际社会视为当然应做的事情,就自己负责地去做”,“特别是安全保障问题”;二、“对努力建设富裕而安定的国民生活的各国,以及像保护地球环境这类人类共同的课题,要尽自己最大限度的努力进行合作。”^⑥《日本改造计划》发表后,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当时的发行量达70万册。小泽的政策主张在政府官僚和中青年阶层引起共鸣和好感。据《朝日新闻》对日本政府官员进行的调查,该书是当年最受关注的政治家著作,在被调查的21名各省厅事务次官中,有13人读过《日本改造计划》,占62.4%。

日本认为冷战终结之后,美国便无理由继续代日本承担和平与自由的代价。”^⑦日本非常担心被美国“孤立”甚至“抛弃”后自己的处境,而贸易立国、经济立国的传统惯性加上现实的经济利益,都极大左右着日本人的国际意识。日本认

^① [日]中曾根康弘等:《冷战以后》,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123页。

^② 中曾根康弘等:《冷战以后》,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③ 中曾根康弘等:《冷战以后》,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④ [日]《外交蓝皮书》(1990年),见日本外务省网站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92/h02-contents-1.htm>。

^⑤ [日]小泽一郎著:《日本改造计划》,冯正虎、王少普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第17页。

^⑥ [日]小泽一郎著:《日本改造计划》,冯正虎、王少普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第66-67页。

^⑦ [日]小泽一郎著:《日本改造计划》,冯正虎、王少普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第68页。

为单方面的经济强大也只能是“小脑袋恐龙”，是“单肺国家”，不能保证多极化格局下日本继续保持繁荣，应该改变国内体制，修改和平宪法，在对外军事上积极起来，保护和扩展日本的利益。具有重要影响的日本经济界认为，为了保卫日本在海外的庞大资产而必须考虑防卫的手段，要求行使被宪法限制的集体自卫权以及要求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日本经济同友会于1991年10月提出题为《日本的前进道路》的报告书主张，为了实现国际贡献而应该进行讨论修改宪法。众所周知，日本宪法第九条制约了日本的军事发展及策动战争的权力。日本右翼势力认为，该条款限制了日本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成为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国际活动的阻碍。^①修宪的提出受到了日本左翼的强烈反对，认为此举与日本战后至今的国家理念背道而驰。为解决右翼提出的“参与维和行动受限”等问题，在海部内阁成为废案的《联合国和平协作法法案》，也于1992年6月在宫泽喜一内阁作为《PKO协作法》获得通过，日本自卫队由是获得了特定条件下出兵海外的资格。

在多极化的格局下，世界各国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日本军事实力的大幅提升以及公然谋求政治大国的态度引起了日本国内与国际社会的普遍不安。考虑到国内较强的和平主义氛围和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邻国的警惕，日本提出相对和缓的“普通国家”战略，认为必须先成为“普通国家”，拥有普通国家拥有的军事等自主权，才能成为政治大国。“普通国家”开始成为日本的战略口号并被实施。但在国际政治方面，日本仍不回避“政治大国”，主要表现就是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并将此视为成为政治大国的重要途径。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解决地区冲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加强，成为世界各国参与国际事务、发挥政治影响的重要舞台。前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说：“（如果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等于承认日本为政治大国……没有日本参加的安理会缺乏可信性。”^②1993年日本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关于安理会改革的建议。^③为了达到“入常”目的，日本广泛

^① Mayumi Itoh, JAPANESE CONSTITUTIONAL REVISION: A Neo-liberal Proposal for Article 9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sian Survey, Vol.41, No.2, (March/April, 2001), p.312.

^② (德)《柏林日报》，1993年7月28日，转引自孙承主编：《日本与亚太》，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112页。

^③ (日)《东京新闻》，1993年10月17日，转引自孙承主编：《日本与亚太》，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112页。

开展“出访外交”、“支票外交”、“热点外交”、“地球仪外交”等，这又进一步加大了国际格局的多极化态势。虽然“入常”成为90年代日本数任内阁一以贯之的共同追求，但是日本依旧面临着国内外的重重压力和障碍。1998年后，日本的“入常”梦暂时偃旗息鼓，但日本在此期间围绕联合国进行的一系列外交行为还是为日本日后继续“入常行动”打下了基础。

冷战结束后，21世纪到来之前，日本作为多极化格局下的一个力量中心，已经预见到随着未来多极化格局的深入，多极化对全球的影响或将通过地区化来实现。因而日本积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回了自己所处的亚洲地区，意识到只有进一步发挥自身在亚洲的领导力和影响力，才能加强自身在多元文明竞相发展的多极化格局中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步入21世纪后，日本将亚洲作为其实现政治大国化的依托，积极作为组织者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提升自身在亚洲乃至国际的影响力；同时继续展开以“入常”为核心的联合国外交，拓展自身在安全问题上的扩充空间，继续朝着“普通国家”的步伐迈进；新宪法草案的制订和通过为日本解除战后最大的束缚——军事束缚创造了可能性；与此同时，随着世界多极化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开始更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的处理和决策之中，恐怖主义的兴起给世界格局的演进增加了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些都给21世纪积极谋求政治大国化的日本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三 多极化格局深化与日本政治大国的演进

进入21世纪后，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进程不断深化，步入了与以往冲突对抗模式截然不同的新型国家关系构建时期。有别于两极格局时期的美苏争霸与多极化初期的“五极”纵横，合作与共赢成为国家间相互交往，相互联系的互动模式。伴随着多极化格局的演进，发展成为大国化的主要途径，一批新兴国家开始群体性崛起。与此同时，经济格局的变化推动了权力格局的调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长期延续“山巅之国”地位的美国之间的联系逐渐加深，双方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基础上互相试探，磨合发展，多极共同发展的国际体系日趋稳定。而对于21世纪及其未来，

日本判断，“国际秩序正经历着快速而深刻的变革，尽管旧秩序似乎正在消失，但一个结构合理、能为世界政治提供范式框架和取向的新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①以此为背景，“日本改变了积极构筑‘美欧三极主导’国际秩序的大国路线，转而采取了以辅助和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地位来换取自身地区主导大国地位的道路。”^②

持续追求政治大国化的日本显然希望在稳定与平和的国际秩序中有所作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引起了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不安，东盟各国也在多极化的背景下加强合作势头日盛。为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抢占东亚地区的经济话语权，日本开始积极在区域经济领域发挥作用。2002年初，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菲律宾等东盟五国，1月13日与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会谈后即签署了“日新自由贸易协定”，加强了日本和新加坡的经贸往来；同年，小泉开始积极推行“10+6”合作机制，号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为核心成员，和中，日，韩及东盟十国一起推进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③从冷战后期日本太平首相倡导的太平洋合作委员会，到APEC的正式建立，再到小泉加强同东盟之间的互动，“东亚共同体”论的提出，以及后来鸠山由纪夫等内阁对“东亚共同体”论的深化，都标志着日本试图从经济领域入手，积极扮演经济区域一体化的组织者和推进者的角色，以提升自己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力和影响力。虽然本国经济不同往日，但日本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地位不容小觑，这也为日本在区域经济中发挥作用提供了保障。

虽然国际秩序趋于稳定，但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多个力量中心都在和平周期内大力发展军事，日本也开始着力突破历史的障碍，积极地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大国的姿态参与国际军事活动。2003年日本发布的《防卫白皮书》上首次提出“将参与联合国的维和活动作为自卫队的主要任务”；^④2004年底，日本出台《防卫计划大纲》，重申将参与国际和平活动作为自卫队的任务之一，日本参与国际和平活动趋于常规化。伊拉克战争中日本追随美国向伊拉克派遣陆上自

^① [日]星野昭吉著：《全球政治学——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动、冲突、治理与和平》，刘小林，张胜军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48页。

^② [日]五百旗头真主编：《战后日本外交史》，吴万虹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288页。

^③ Takashi Terada, *The Origins of ASEAN+6 and Japan's Initiatives: China's Rise and the Agent-Structure Analysis*, *The Pacific Review* 23(1), 2010, p.71.

^④ 《平成15年防衛白書》[EB/OL], 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03/2003/index.html, 2003年。

卫队，打着“人道主义救援”的旗号完成了战后日本首次海外军事任务。除此之外，日本还试图通过修宪等手段积极突破，为军事大国化乃至政治大国化的实现扫清障碍。安倍晋三上台之后，不顾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周边国家的抗议，提出和平宪法第九条的修正案，旨在将“不保持海陆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一限制日本军事发展和海外派兵的条款拿掉。安倍在接受采访时称，“我国宪法应当将自卫队规定为‘军事力量’，即使我们修改了宪法第九条，日本在军事上也只会和世界各国处于同等地位。”^①日本的军事再回归引起了周边国家的极度不安，日本表示“每年都会防卫白皮书上公布自卫队装备的种类和数量等信息，努力确保军备的透明性”，^②但该保证在日本大幅增长的军费支出及不断扩充的军备实力的情况下，并不被周边国家普遍接受。

国际秩序虽然仍然主要受多极化的格局所影响，但也因非国家行为体影响力的增强出现了一些不确定性。进入21世纪后，恐怖主义抬头，制造了震惊全球的“9·11事件”。“9·11”后，反恐开始成为美国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发动两场战争之余，美国加深了和中、俄等大国在反恐上的联系。日本作为美国坚实的盟友，也以相当积极的姿态加入到世界反恐的阵营之中，组建了特种作战部队，反恐军费连年增加。2001年9月19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宣布“日本的军事力量将会在美国打击塔利班的过程中发挥永久性作用”，^③并提出七项具体措施，包括加强美国在日本的基地等。为了打破日本在境内外进行反恐活动的限制，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相关法律的制定。2001年十月，日本通过《反恐特别措施法》，2004年又制订《预防恐怖主义行动计划》，为派遣自卫队进行反恐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日本还利用自己经济大国的身份，从2005年起制订了一系列法律和条款以冻结恐怖分子的资产，为全球反恐助力；近年来，首相安倍晋三重新制定了日本的反恐政策，提出“日本应在国际安全环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为其在国际安全方面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提供宪法依据”。^④不难看出，在国际力量中心相互依存的多极化格局下，日本期望自己以大国姿态参与国际安全事

^① Shinzo Abe, Japan Is Back: A Conversation with Shinzo Ab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3, p.6.

^② 《平成13年防衛白書》[EB/OL], 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01/honmon/index.htm, 2001年。

^③ Heginbotham Eric, and Richard J. Samuels, Japan's Dual Hedge,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5, 2002, p.131.

^④ Juan C. Zarate, The Japan-U.S. Counterterrorism Alliance in an Age of Global Terrorism,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rch 2016, pp.8-9.

务，扩大自己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影响力和带头作用。

在多极化深化的背景下，非国家行为体也逐渐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20世纪90年代“入常”失败后，2004年日本重新开始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希望借此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为其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提供助力。2004年9月21日的联合国大会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发言中表露了日本对“入常”的渴望，同年由巴西，印度，日本，德国共同提出的“增设四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也无疾而终。随后，日本的数位首相也显露出对“入常”的追求，2011年首相野田佳彦借助联合国大会的机会积极开展外交，希望能够突破历史的桎梏，为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找到突破口。然而，野田佳彦在演讲中也仅仅表达了日本对联合国的支持，并没有表示任何积极的承诺或具体的建议，因而同他的前辈们一样没有取得什么成果。^①数年来遇到的挫折并没有使日本放弃“入常”的念头，日本依旧积极围绕联合国展开外交，以此加强自身在政治上的国际影响力。除联合国外，日本还积极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例如积极地赞助国际捕鲸委员会中的小国，尤其是那些会在国际事务中给日本投赞成票的小国，^②以换取其在政治上对自己的支持；除此之外，日本还积极地向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输送人才，赴外工作的员工薪水由日本外务省支付，希望借由人才输送更多地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力，发出日本的声音。

国际格局的演进和国家模式的竞争互为因果，放眼未来，多极化的格局仍将继续深化，世界的力量中心多元并存，相互依存，或将在多元文化的共同影响下构建出多元并存的格局，最终实现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理想格局。^③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崛起的国家必将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本在区域和全球的经济地位和影响力的相对衰弱会促使日本加强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决心，日本必将进一步加快谋求政治大国化的步伐，增强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力和影响力。2016年10月26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举行会议，决定将党首任期由“最多两届共六年”修改为“三届共九年”，由此，日本现首

^① Masatsune Katsuno, Japan's Quest for a Permanent Seat o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January 2012, pp.2-4.

^② Jonathan R. Strand & John P. Tuman, Foreign Aid and Voting Behavior in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e Case of Jap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8, No.4, 2012, pp.409-410.

^③ 刘江永：《国际格局演变与未来的中美日关系》，《日本学刊》，2010年第1期，第19页。

先安倍晋三或可将执政延长至2021年。^①作为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下日本谋求政治大国道路上的重要人物，安倍晋三或将有更多时间和空间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处理这一任期内堆积的外交问题，为实现日本的政治大国化铺路。

四 日本政治大国的障碍因素

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中国等力量中心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显，日本显然希望在多力量中心的国际格局中有所作为。此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不断要求日本对自己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定位，要求日本在东亚乃至世界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一些区域国家也希望日本发挥更大作用。日本在自身利益与外部压力的驱动下，仍将持续追求政治大国目标。然而，日本目前依旧处在非自由主义的道路上，无论是修改教科书还是首相数次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以及潜在的修正主义即正常国家主义对历史污点的错误认识都逐渐在日本政治精英眼中变得寻常、流行、甚至逐渐成为主流，^②这样的态度必然难以被国际社会尤其是曾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伤害的周边国家所接受。在未来世界力量中心相互依存，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的国际格局下，日本这种持续追求政治大国化的道路无疑漫长。

首先、美国不愿意让日本真正地成为政治大国，分享美国的权力，威胁美国的利益。战后美国的对日政策，都是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来控制 and 利用日本。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是通过借助日本的力量来维护美国在亚太乃至世界的领导地位，分担美国的“负担”，而不是给日本颁发政治大国的“通行证”。对美表现出离心倾向的鸠山由纪夫内阁的倒台就是实证。另一方面，日本对美国的过分依赖特别是日美安保同盟也导致日本很难脱离美国成为独立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政治大国。

其次、日本对历史问题缺乏深刻的认识和反省、以及在军事方面的动作，破坏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邻国的信任。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时任韩国外交通商部

^① 中新社2016年10月27日电：《安倍拟执政至2021年 或成日本战后在位最长首相》，<http://www.chinanews.com/gj/2016/10-27/8044727.shtml>。

^② Koichi Nakano, *New Right Transmission in Japan*, in Mark R. Mullins & Koichi Nakano, eds., *Disasters and Social Crisis in Contemporary Japan: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Socialcultural Respons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25.

长官的潘基文曾说：“对于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席位的国家，应当具有最重要的资质之一，就是看它是否得到邻国的支持和信任。”^①日本在处理地区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显然还和获取“资质”有一定距离。韩国最大报纸《朝鲜日报》在社论中强调，衡量日本能否成为常任理事国，不能以金钱而应以道德为标准，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存在“道德障碍”。日本的亚洲外交陷入历史泥潭^②，在地区政治中陷入孤立^③，遑论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大国了。

第三、持续低迷的经济使日本在追求政治大国的道路上日益缺乏底气与实力，尽管这刺激着日本新保守主义和右倾化的高扬并间接推动着政治大国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出现持续的不景气，暴露出日本经济结构性矛盾。同时，日本也没能抓住新一轮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型经济，加上国内经济改革的效果甚不明显，日本经济的低迷仍将持续。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期间，日本经济大幅受挫，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2013年日本银行行长在大阪的商业领袖座谈会上称，“日本经济的外部需求在减弱”，同时出具的图表显示日本的长期利率远低于美、德，通胀率却逐渐上升。^④同时，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中日差距的日益加大，日本在谋求地区领导权方面也越来力不从心。

第四、日本缺乏成为政治大国的文化“软实力”。日本的等级文化和“内外有别”的集团主义使日本缺乏国际大国的眼光和能力。1985年，日本《外交蓝皮书》就提出要改变日本社会的惯例和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国内体制，使其同国际社会“同质化”。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认为，如果不从本质上改善日本“内外有别”的心理结构，“是无法实现真正的国际化的”^⑤。1990年，日本国际政治学家舛添要一在《宝石》刊物上发表《90年代日本的生存之路》一文中也观察到，在谋求世界霸权的要素中，日本最缺文化，舛添认为必须用某种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树立起令人羡慕的“日本哲学”，这“将决定日本今后的命运”。

^① 《谁能成为新常任理事国》，《环球时报》，2004年12月6日，第7版。

^② 孟晓旭：《日本的二战史观与安倍政权的选择》，《当代世界》，2015年第7期，第34页。

^③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230-231页。

^④ Haruhiko Kuroda, Japan's Economy and Monetary Policy: Speech at a Meeting with Business Leaders in Osaka, Bank of Japan, November 5, 2013, pp.1-13.

^⑤ [日]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编：《90年代日本的课题》，彭晋璋监校，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年，第546页。

五 余论

一方面，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战略目标，也都有为之努力奋斗的权利。日本立足于自身发展状况并根据国际格局演变不断调整、评估或改变战略选择，追求政治大国无可厚非。但作为曾经的战争发起国与侵略国，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尚未能被国际社会对之信任和接受，其在追求政治大国和普通国家的过程中对军事的再回归难免令人担忧。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接受采访时称自己“已经在任期内多次表示过对历史的悔恨之意”，在于国际社会所质疑的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安倍表示“只是像美国总统参拜阿灵顿国家公墓一样，祭奠那些服务于国乃至献出生命的人民”。^①试图将自己对历史“逆反”行为定义为一个普通国家的领导人的正常举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日本的政治大国追求对当前出于战略机遇期并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有着相当的启示作用。首先，中国应避免发生对经济力量产生误读和误用。当今，国际政治仍然是实力政治，世界政治的角色定位是以国家的综合实力为依据的。但日本政治大国的追求中过于偏重于经济视角，以为谁的经济强谁就理应当是领导者，甚至认为自己对“入常”的合理追求是建立在自己对联合国会费的贡献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中国要避免滥用经济实力。其次，中国必须要跟上世界经济发展步伐，改革国内的经济结构，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打好基础。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更好地保持和延续良好的发展势头，最终实现“中国梦”。日本对政治大国追求的动力不足很大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长时间处于低迷状态。再次，崛起的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必须要把握世界规则的话语权。日本对国际规则的关注启示中国也要积极参与和制定全球性的制度和规则，保持介入世界以及与世界进行对话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维护和增进全球化进程中开放的国家利益。最后，中国更要努力经营好周边，落实好周边外交的工作方针。周边是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日本政治大国难以实现的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周边国家的信任和支持。中国应努力与周边国家共建“命运共同体”，夯实“一带一路”战略，带动区域发展，以中国的优秀文化融洽周边，融合世界，实实在在地发挥出中国的世界影响。

^① Shinzo Abe, Japan Is Back: A Conversation with Shinzo Ab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3, p.4.